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 左鹏军主编

學南嶺

陳永正題



第一輯

中山大學出版社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 左鹏军主编

嶺南學

第一輯

陳永正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学·第一辑/左鹏军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978-7-306-03006-1

I. 岭… II. 左… III. 文化史—研究—广东省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4044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红 枫

责任校对: 陈 霞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 889mm × 1194mm 1/16 12.5 印张 37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的兴起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是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稍后渐盛的地域文化研究即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必然结果。近年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从一般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向地方专学的转换,多种地方专学如徽学、闽学、蜀学、湘学、楚学、晋学、上海学等的被提出和论证就是明显的表征。这固然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深化发展的学术逻辑,也与当下各地对传统文化、国学典籍、文化遗产的空前关注关系密切。因此,这种转变反映了纯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现实文化关怀相统一的通达观念,反映了学术与文化发展的必然。

与以往许多关键性历史时刻相似,新时期的岭南文化曾再得风气之先,取得了突出成绩,其影响已远超岭南之外;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岭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已到了关键阶段,岭南文化研究也面临着持续发展和全面提升的繁重任务。从岭南文化研究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岭南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来看,当前有必要强调建设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保证岭南文化研究不断发展、持续繁荣的学理前提。“岭南学”学科概念的适时提出和积极构建,就是这种学术努力和现实关怀的体现。

学科概念的提出与确立通常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五岭以南,南海之北,界于中原,交通海外,以与中国文化中心区域相距遥远,有时被称为岭表、岭外,有时又被称为岭海、岭峤;这里的物令节候、言语习俗与中原相比多有殊异,时给人陌生神秘之感。实际上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期这里已颇显独特气象,唐宋两代可谓岭南文化发展的关键,明至清中期岭南文化渐趋繁荣,而晚清民国时期岭南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均已臻致空前。因此,近现代多位学者曾特别瞩目岭南的学术与人文。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新会梁启超论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标举四川与广东,指出广东背岭面海,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与中原迥异,遂特别标举“粤学”;顺德黄节也曾撰专文论述“岭学”源流;陈寅恪也曾在晚年提出要建立“南学”。凡此均可视为基于对岭南学术文化传统的深切体认,建立岭南地域专学的具有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努力。时下提出和构建“岭南学”,不仅与这些学科积累、学术观念密切相关,而且是其发展与深化。

近年岭南文化研究日益丰富繁荣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深化学术水平与提升学术地位的要求。一方面是原有优势的持续发展和对薄弱环节的弥补充实,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港澳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香山文化、雷州文化、粤西文化、粤北文化、海南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一方面是专学名称的提出和构建,如以族群或区域命名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以宗派命名的罗浮道学、慧能禅学,以人物命名的白沙学、黄学。这些地方专学的出现,均反映了各地对乡邦文化的深情系念和对历史遗产的强烈关注,也是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对岭南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岭南学”与建设中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诸学,既有密切关联,因为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 with 目标相关;又有显著区别,相互之间并不能等同,也就不存在彼此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在思维逻辑和学理事实上具有平面交叉、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应当构成相辅相成、互补共进的格局。

从岭南文化到“岭南学”,是对岭南文化及其研究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反思的重要标志,是为相关研究提供足够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支持的显著成果。这种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学术努力所追求的,就是以以往的岭南文化研究为起点,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借鉴其他领域或学科的建设经验,着眼于当

下建设与未来发展,全面提升岭南文化研究水平,使之真正走上规范化、学科化的道路。这种努力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历史积累、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对学术界提出的必然要求,这是一项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文化建设任务。因此,“岭南学”学术构想的提出,既具有长远的学术意义,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文化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地处南国五羊古城,岭南文化研究一直是我校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批学者以乡邦文献与岭南文化为研究重点,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至80年代中期,我校成立了比较专门的岭南文化研究机构,凝聚了更多的人才,发表了多种成果,学术特色得到充分彰显。2005年,我校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被正式批准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我校的岭南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地根据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建设规划,将“岭南学”作为研究重点和学术特色之一,希望在“岭南学”的学科概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实践经验、未来发展等方面对这一学科的建构做出扎实的学术努力,奠定牢固的学术基础。这是基于对我校学术传统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是基于对岭南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关注。因此,我校的岭南文化和“岭南学”研究应当承担起更多的学术责任,也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现代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文化传承理念在“岭南学”的建构与发展中同样应当得到充分的展现。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这是人文学术的主要方法和理想目标;学术有法度,研究贵创新,这是人文学术日新其业的重要前提。“岭南学”学术概念和学科构想的提出,虽已经反复斟酌,多方思考,也已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但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岭南学”的正式建立,还需要做出扎实的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可谓任重而道远。也许,这一探究求索过程本身的学术意义和蕴藏的学术可能性就是重要的。本书既以“岭南学”名之,意在继承发扬先哲的学术传统,彰显光大时贤的学术观念,积极参与和推动当下的“岭南学”建构,为学界提供一个专门的学术园地,共襄“岭南学”之大业。

历史上的岭南曾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当代岭南同样负有重要而特殊的文化使命。今《岭南学》既已创立,愿我们的学术期许在不久的将来,逐步获得实现,能够有所成就;愿我们的学术理念和追求在广泛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发展深化,获得愈来愈多的知音。当此海晏河清、学术昌明之时,值此国泰民安、文化复兴之际,我们自当以学术的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作出我们的贡献。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国健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王国健	1
--------	-----	---

岭南诗派略论.....	陈永正	1
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	陈建森	7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关爱和	13
黄世仲近事小说中的广府风情	纪德君	18
陈中凡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创立	彭玉平	27
明清会馆演剧述论		
——以广东会馆演剧为例	李 静	34
粤曲融合本土四个曲艺曲种概述	谢伟国	43
岭南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	詹伯慧	47
论汉语南方方言中的 6、d 声母	邵慧君	60
粤语多源论	甘子恩	65

源远流长的女神主义神话		
——岭南龙母文化的一种新探讨	杨 朴	71
略论南汉政权对唐朝都城管理制度的模仿	吴宏岐	77
陈白沙理想境界实现途径的道家品味	张运华	83
黎简文化性格刍议	张 琼	93
黄遵宪与日本冈鹿门的文字因缘	郑海麟	99
胡曦对岭南方志学的贡献述略.....	郭真义	106
近代中国早期维新士人的民主政治思想.....	谢 放	110
有关陶希圣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	李 杨	120

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关溪莹	126
逃避与屈从：自梳女对婚姻的矛盾心态·····	杨锦奎	132
饭桌上的传说		
——从潮汕特色饮食窥测其族群的传统与变迁·····	李荣峰 肖自力	138
会馆建筑：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正刚	144
刘轲事迹考述·····	蔡 衡	152
清人江德量过录何焯校宋本《说苑》考述 ·····	邓骏捷	161
林凤冈与《石岳集》 ·····	梁基永	165
药洲小考·····	张之为	168
说“飞墘” ·····	汪叔子	173
广府春节民俗与广府文化		
——叶春生教授访谈录·····		186
稿约·····		193

岭南诗派略论

陈永正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 岭南诗歌源远流长, 并形成了岭南诗派; 岭南诗派是在岭南诗歌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岭南诗派表现出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创作面貌, 其雄直诗风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岭南诗派得以成立, 依赖于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一是“岭南”的地域特色; 二是以“雄直”为主体风格的“诗派”。

关键词: 岭南诗派; 岭南地域; 雄直

唐宋两代, 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 而岭南诗歌仍在成长阶段。岭南诗坛上只有张九龄、余靖等少数名家取得较大的成绩, 但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诗派。直到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出, 岭南诗派才实际建立起来, 同时, 也标志着岭南诗歌进入成熟期。

最早标举出“岭南诗派”一语的是明代诗学家胡应麟。他说: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 越诗派昉刘宗周, 闽诗派昉林子羽, 岭南诗派昉于孙贲仲衍, 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 咸足雄踞一方, 先驱当代。”^① 胡氏认为明初中国诗坛有吴、越、闽、岭南、江右五大诗派, 又说明代中叶正德、嘉靖间的诗坛, “自吴、楚、岭南外, 江右独为彬蔚”。^② 即以吴、楚、岭南、江右四大诗派为代表。孙贲是元末明初的岭南诗人、南国诗社的发起人、“南园五先生”之一, 胡氏特举出他作为岭南诗派之始, 是很有见地的。《四库全书总目》评《广州四先生诗》时, 也把孙贲以及王佐、黄哲、李德、赵介等四先生称为“粤东诗派”的代表, 谓“粤东诗派, 数人实开其先, 其提倡风雅之功, 有未可没者”。而正德、嘉靖中岭南诗派的代表人物, 当指黄佐及“南园后五先生”。清初学者朱彝尊说: “岭表自‘南园五先生’后, 风雅中坠, 文裕(黄佐谥号)力为起衰, 如黎惟敬、梁公实辈, 皆其弟子。嘉靖中, ‘南园后五先生’, 二子与焉。盖岭南诗派, 文裕实为领袖, 不可泯也。”^③ 这段话可作胡氏之论的诠释。把黄佐和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等南园后五先生看做是孙贲等南园前五先生的继承者, “岭南诗派”也因而得到延续。降及明代后期, 岭南诗派又有新的代表人物, 岭南诗歌发展到新的阶段。清初诗评家王士禛说: “粤东诗派, 皆宗区海目(大相), 而开其先路者邝露湛若也。”^④ 把区大相、邝露作为明末岭南诗派的先驱人物, 而王氏心目中“粤东诗派”, 当指明末清初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及其周围的一大批诗人, 如林枫所说的: “岭南诗派屈梁陈, 一代风骚鼎足身。”^⑤ 三家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岭南诗派中最杰出的诗人。屈大均的影响远至江浙, 至有“翁山派”之称。嘉庆年间诗人李黼平认为: “天下之诗派有三: 河朔为一派, 江左为一派, 岭南诗自为一派。”^⑥ 把岭南诗派与河朔诗派、江左诗派并列为全国三大诗派。道光年间, 诗人邓显鹤曾赞叹: “今海内竞称岭南诗派。”^⑦ 可见岭南诗派影响力之巨。清末盛宣怀为郑观应《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作序, 亦特标岭南诗派之名。

近代学者汪辟疆对岭南诗派做过系统的评述: “岭南诗派, 肇自曲江(指张九龄)”, “迄于明清, 邝

① 胡应麟:《诗数》续编卷一,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336页。

② 同上书, 续编卷二, 第354页。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97页。

④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带经堂诗话》卷十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274页。

⑤ 林枫:《论诗仿元遗山体》之五, 转引自郭绍虞等编《万首论诗绝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361页。

⑥ 李黼平:《着花庵集·自序》, 民国梅县古氏铅印本。

⑦ 邓显鹤:《九芝草堂诗存·序》,《南村草堂文钞》, 咸丰元年本。

露、陈恭尹、屈大均、梁佩兰、黎遂球诸家，先后继起，沉雄清丽，蔚为正声”，“乾嘉之间，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瀚平诗尤为有名”。汪氏把黎简、冯敏昌等人看做是岭南三家的继承者，并认为他们恪守岭南诗派独具的“高格”、“清音”，“雄直”二字，岭南派诗人当之无愧也。^①

及至近代，岭南诗派仍为学者所承认。汪辟疆又指出：“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一、湖湘派；二、闽赣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岭南派；六、西蜀派。此六派者，在近代诗中皆确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者也。”汪氏又谓近代岭南派诗家中，当以朱次琦、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为领袖，而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何藻翔、邓方羽翼之。并特别提出“康梁诗派”一词，以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新派诗作为标志。汪氏总结近代岭南诗派特点云：“此派诗家，大抵怵于世变，思以经世之学易天下，及余事为诗，亦多咏叹今古，指陈得失。或直溯杜公，得其沉郁之境；或旁参白傅，效其讽谕之体。故比辞属事，非学养者不至，言情托物，亦诗人之本怀。其体以雄浑为归，其用以开济为鹄，此其从同者也。”^②

自元末明初至近代，岭南诗派已成中国诗坛上公认的重要流派。六百年来，不绝于书，直至今天，仍有学者提出振兴当代岭南诗派的问题，^③ 岭南诗歌的传统一脉相承，芳菲未沫。

岭南诗派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诗歌流派。按照现在流行的文学理论，文学流派的形成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②审美观点比较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③有一定数量的作家群体；④有公认的一个或几个代表人物。文学流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到了一定时期它又会自然消亡。^④ 如果都按这些标准去衡量的话，岭南诗派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正规”的文学流派。但岭南诗派这一名目，从明代到当代五六百年间，一直被诗人、诗评家沿用着，可见它一直是存在着的，并且为人们所承认。

岭南诗派是在岭南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过唐宋数百年的酝酿，直到元末明初才比较明确地形成，以后一直延绵不断，直至当代，其流风余韵依然未绝。

岭南诗派是一个整体的名称，它包含了不同时期的各个诗人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每个时期都有着当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派的形成，是与历代诗社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岭南诗人喜结诗社。见于载籍者，从宋末赵必瑤、李春叟、陈纪诸人在东莞乡间结吟社始，至近代八百年间，粤人结社从未间断，其中以南园诗社影响尤大。元末孙贇等五人在广州创建南园诗社，他们为诗，亦“不失唐音”^⑤，明中叶欧大任等五人重修南园诗社，更是“羽翼盛唐”、“入唐人之室”^⑥。明末陈子壮、黎遂球等十二人，复集南园诗社。清末梁鼎芬、黄节等八人重开南园后社，号召振兴广东诗学。诗社的建立，维系着一个创作群体，坚守着一些创作理念，对岭南诗派的传承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岭南诗派是与南园诗社相始终的。

岭南诗派只局限于岭南地区，诗派中的人物都是岭南人或落籍岭南的人。由于地处僻远，诗派人物较少与中原相接，不随时代风气转移，所以岭南诗歌能长期保持较一致的风格。如翁方纲所说的：“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⑦ 岭南人既有进取的一面，也有其固守的一面。重视自我，不易受人左右，不愿随波逐流。这也表现在岭南诗风上。前人常以“不变”二字论粤诗。岭南三家对此感受尤深。陈恭尹云：“百川东注，粤海独南其波；万木秋飞，岭树不凋其叶，生其土俗，

①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② 同上书。

③ 王季思：《振兴岭南诗派的设想》，《诗词》1988年第2期。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2页。

⑤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⑥ 欧大任等：《南园后五先生诗》附诗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⑦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6页。

发于咏歌，粤之诗所以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也。”^①又谓粤人“每于天下所趋者，必居人后，而其所自守者，亦往往执而不移，地气使然也”^②。梁佩兰亦云：“盖尝与独漉、翁山论诗，谓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风气之内。诚以诗之高在标格，远在神韵，精在骨髓。”^③屈大均谓晚明粤诗人，“其雄才绝力，皆可以开辟成一家，而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陨越。所著悉温厚和平，光明丽则，绝不为新声野体，淫邪佻荡之音，以与天下俱变，是皆岭南之哲匠也”^④。

岭南诗派这个词是由外省的文学理论家首先提出的，也为外省诗人所习用。直到清代，广东诗人才接受岭南诗派一词，或自称“吾粤诗派”、“曲江诗派”、“广东诗派”。

岭南诗派，发轫于唐宋，形成于明，大盛于清，至近代而更新变化，历时六百余年而不衰。可以这样说，一部岭南诗史，基本上是岭南诗派的发展史。

岭南诗派具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标举唐音

历代的岭南诗人，多以唐诗为宗，不随风气转移。明末薛始亨为陈子升《中州集》作的序中写道：“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诗数变，独粤中犹奉先正典型。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庶几才术化为性情，无愧作者。”屈大均亦云：“吾粤诗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开风气，千余年以来，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户汉魏，皆谨守曲江规矩，无敢以新声野体而伤大雅，与天下之为袁、徐，为钟、谭，为宋、元者俱变。故推诗风之正者，吾粤为先。”^⑤汪辟疆亦云：“岭南诗派，肇自曲江。”^⑥曲江，指张九龄。张九龄诗，是所谓大雅元音，继承汉魏的传统，而又参以楚辞的表现手法，崇尚高古的格调，这就是千余年来岭南诗人所尊奉的“唐音”，也就是所谓的“曲江规矩”。因而有人把岭南诗派直称为“曲江诗派”。

所谓唐音，是指唐诗及其风格。

南园五先生，作为岭南诗派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特色就是标举唐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自（孙）蕡以下，世所称南园五先生也，仲衍（孙蕡之字）才调，杰出四人，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微嫌繁缛耳。”清人韩海在《郭苾亭诗集·序》中指出：“吾粤诗多以唐为宗，宋以下概束高阁。远自南园五先生开其源，近则屈、梁、陈三大家树之帜。粤人士从之，翕然如水之赴壑。”以南园前后五先生及岭南三大家为代表的岭南诗派，以唐为宗，七百年来，相承一脉。

南园五先生之首孙蕡，为诗力追三唐，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梁守中点校《南园前五先生诗·前言》中，引录徐泰《诗谈》谓孙诗“清圆流丽”，黄佐《广州人物传》谓孙诗“气象雄浑，兴喻深致”，引录叶处元盛赞其五七言古风“虽唐人不能远过”，李时远亦谓“其七言古体不让唐人”，引录《四库提要》谓“其诗独卓然有古格”^⑦。如此种种，都说明孙蕡诗所标举的正是唐音。所谓“清圆流丽”的，如《寄王彦举》、《古意二首》、《广州歌》、《白云山》、《戏赠端孝思》、《过扬州》、《闺怨》等诗可为代表。而所谓“气象雄浑”的，可以其大量的七古为代表，如《送何都阃济南省亲至京还广》、《送翰林典籍张敏行之官西上》，宛然高、岑格调，而《次归州》、《下瞿塘》则笔力老健，意态横肆，在李、杜之间。孙蕡之外，其余如赵介“出入汉、魏、盛唐诸大家阃奥”，李德学李白、李贺，黄哲“造晋、

① 陈恭尹：《征刻广州诗汇引》，《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4页。

② 陈恭尹：《岭南五朝诗选·序》，《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1~892页。

③ 梁佩兰：《东轩诗略·序》，《六莹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7页。

⑤ 屈大均：《广东文选自序》凡例六，《屈大均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⑥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⑦ 孙蕡、欧大任等著，梁守中、郑力民点校：《南园前五先生诗 南园后五先生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唐奥域”，王佐“雄俊丰丽”，皆自唐人出。

南园后五先生之诗，都是典型的唐音。《南园后五先生》卷首《诗评》中引朱用晦语，谓欧大任“歌行准嘉州（岑参），间出青莲（李白）语，近体羽翼盛唐，七言佳境，颇类龙标（王昌龄）”；又引曹能始语，谓梁有誉“已入唐人之室”，“词意婉约，殊有风人之旨”；又引陈玉叔语，谓黎民表“歌行恢张而润，达夫（高适）、嘉州之遗也；五言清而逸，排律整而洁，浩然、仝期之遗也”；又引李时远语，谓黎诗“和平典雅，飒飒乎盛唐遗响”。

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都尊崇李白、杜甫。屈大均诗，同时人皆许为李白。潘耒《广东新语·序》云：“翁山之诗，祖灵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类托讽，大都妙于用虚。”宋长白《柳亭诗话》云：“《翁山诗外》力祖唐音，而于太白为近。张祖望诗‘吾爱屈翁山，诗词拟李白’是已。”梁善长《广东诗粹》云：“一灵（大均出家时之字）自谓五律可比太白，而气体亦多似杜。”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谓：“翁山五言，神似青莲。”谭献《复堂日记》谓屈氏“神似太白，不徒形似”。屈大均自谓可比李白，也得到诗坛的一致认可。陈恭尹诗风格多样，费锡璜云：“元孝幽淡冲素自为一体，在屈、梁二家中其犹孟襄阳乎？”^①王士禛《渔洋诗话》谓陈诗“清迥绝俗”，“得唐人三昧”。彭士望《独漉堂集·序》云：“予故谓元孝，今之杜甫也。”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则以杜甫比之，谓其“七言不减工部”。梁佩兰诗，王隼《六莹堂集·序》谓其“从汉魏人”，然亦学“青莲、少陵诸子”。

清代及近代岭南诗派的代表人物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朱次琦、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丁惠康、梁启超等，亦以唐为宗，间有参取汉魏或两宋者，前人多有论述。

二、诗风雄直

诗人洪亮吉以“尚得昔贤雄直气”^②评价岭南诗，早成定论。昔贤，当指汉魏三唐中诗风雄直的杰出诗人，尤其是对岭南诗歌有重大影响的韩愈和苏轼。张籍《祭退之》诗：“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即以“雄直气”许韩愈。雄直气，指诗歌的境界雄伟，气势劲厉，音调高亢，直抒胸臆，得“阳刚”之美。陆蓁更把这种雄直气解释为作品的风格：“国朝谈诗者，风格道上推岭南。”^③刘世南也说：“岭南诗派的名称，由来已久。即以明末清初而论，它除了反映一种地方色彩……更主要的却因为它风格道上。”^④

岭南雄直诗风，源远流长。张九龄诗，既有雅正冲淡一面，也有沉郁雄伟一面，宋人余靖诗苍劲朴老，崔与之诗高华壮亮，宋末遗民诗尤为悲慨苍凉。唐宋名家的诗风，影响深远。驯至南园五先生，孙贲诗气象雄浑，王佐诗雄俊丰丽，亦近乎雄直之境。明中叶学者黄佐，其诗雄伟奇丽，壮浪恣肆，有“粤中昌黎”之称，直接影响到南园后五子。黎民表诗沉著清劲，欧大任诗气格沉雄，梁有誉诗意趣沉实，诗风亦有相类之处。稍后的区大相，王士禛《渔洋诗话》称其“力祛浮靡，还之风雅”，为粤东诗派所宗。

最能体现岭南雄直诗风的当为明末及清初的“岭南前三家”和“岭南三大家”。前三家指被誉为“粤中屈原”、“粤中李白”、“粤中杜甫”的邝露、黎遂球和陈邦彦。邝露诗汪洋恣肆，黎遂球诗苍劲悲凉，陈邦彦诗雄奇老健。明末陈子壮、张家玉、梁朝钟以及清初一大群遗民诗人，风格虽各有不同之处，然皆多有雄直之气。可以说，岭南诗歌的雄直诗风，至明末而大备了。

① 转引自沈用济编《道援堂集·附记》引，《道援堂集》，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② 洪亮吉：《更生斋诗》卷二，《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嘉庆间刻本。

③ 陆蓁：《问花楼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2页。

④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第二章，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岭南诗派雄直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 岭南地区独特的民风

清温汝能《粤东诗海·序》对岭南民风做过准确的概括：“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发。故民生其间者，类皆忠贞而文明，不肯屈辱以阿世，习而成风。故其发于诗歌，往往瑰奇雄伟，轶轹今古，以开辟成一家言。”其《粤东诗海·序》又云：“粤东濒大海，宅南离，山禽水物，奇花异果，如离支、珊瑚、玳瑁之属，莫不秉炎精，发奇采。而民生于其间者，亦往往有瑰奇雄伟之气，蟠郁胸次，发于文章。”温氏指出，粤人秉阳刚之气，形成雄伟瑰奇的诗风，格调高雅，不作靡靡之音，故亦有异于中原、江左之作。

岭南居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土著的越族；二是南迁的汉族。古越族人性情强悍，敢于抗争。南迁汉人，多为戍卒、谪宦、商人、逋客，或因时势逼迫，或进取创业，筚路蓝缕历尽险阻而来，特别是两晋之间、唐末、两宋末几次大迁徙，能顺利到达岭南的都是体力和智力较为强健的人。越族和南迁汉族逐步融合（还融进部分浮海经商的外国人），遂形成延续至今的岭南民系。

北宋初章粦来到广州，对岭南民风有深刻的感受：“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①清人邓之诚又云：“岭南滨海之人，狎波涛，轻生死，嗜忠义若性命。”^②二人把岭南民众为“义”、“利”而不惜冒险犯难的精神做了很好的概括。

岭南地区独特的民风，粤人性情豪纵真率，独立自强，勇于进取，敢于抗争。这都是“雄直”诗风的精神基础。

2. 岭南诗风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时期

岭南诗歌最繁荣的几个时期，恰是国家遭到重大变故的时候，如宋末、元末、明末和清末。宋末和明末，岭南是最后的据点，不少热血志士，在武装反抗强敌的同时，也以诗歌表现自己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元末和清末，诗人在热切地呼唤新的时代，诗中充满着对未来的理想。清末两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策源地都在广东。诗人得风气之先，直接用诗歌来鼓吹政治变革，故其诗风亦多雄强发露。

3. 唐宋时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宋时期入粤诗人，尤其是韩愈和苏轼，其雄奇险劲以及豪放自然的诗风，对岭南诗坛影响极大，以学韩、学苏名世者代有其人。

4. 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

岭南，是所谓的“南州远徼”、“偏方之地”。由于大海和五岭的阻隔，岭南自成一域，不易与“北人”交往，岭南诗坛也不易受到中原、江左流行诗风的影响，以不变应万变，长期以来保持自己固有的传统。对此，北来的学者亦有认识。王士禛云：“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③潘耒《羊城杂咏》亦云：“地僻未染诸家病，风竞堪张一旅军。”但“地僻”只是次要的原因，没有抗体，要染病随时会染病。

三、地方色彩鲜明

岭南，由于其地域的特殊性，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都与中原有较大差异。岭南诗人诗作，讴歌山川名胜、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自然带有鲜明的乡土气息。

① 元大德：《南海志》引《广州府移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②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③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1页。

四、富于革新精神

岭南诗人标举唐音，但不盲目复古。历代优秀诗人，每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唐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宋余靖以其朴老之作，一洗西昆的铅华；南园五子一反元诗的浅薄靡弱，上追三唐；岭南三家力扫明代复古之风；清黎简、宋湘锐意创新，拔戟自成一队；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更成为“诗界革命”的主要人物，给传统诗歌增添了生气和活力。

五、善于向民歌学习

岭南地区自古就是歌谣的国度，诗人从小沉浸于民间歌谣之中。如客家地区的山歌、白话地区的粤讴、潮州地区的歌册以及蛋民的摸鱼歌、咸水歌等，“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①，不少诗人都受到民歌的影响，在创作实践中汲取民歌的语言及表现手法，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笔者想强调的是，岭南诗派之所以得名，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岭南”的地域特色。如诗人的岭南籍贯、诗歌中的岭南地方色彩等等；二是以“雄直”为主体风格的“诗派”。如果不从风格学上进行区分，所谓“诗派”，则难以认定。六百年来，一批又一批被认为是岭南诗派的优秀诗人，其主体诗风始终不离“雄直”二字，只有两个因素都具备的诗人，才能真正算是“岭南诗派”中人。

岭南诗派雄直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张九龄的“唐音”，然后是宋代余靖、崔与之、李昉英等人的“风骨”。明代南园前后五先生以及黄佐、区大相等，均以“上追三唐”为标的，继承“曲江规矩”。直到岭南三家出，才把雄直诗风推到最突出的位置。人们心目中的岭南诗派，就是以岭南三家的雄直诗风为准则的。岭南诗派的地域性减弱，而风格特征则增强。有清一代，岭南诗人也进行着多方面的尝试，但总的来说，有成就的诗人大都偏向“阳刚”而不是“阴柔”的。即使如黎简那样“深曲”的诗人，放弃了“直露”，但依然追求“雄奇”。

人们也许会误解，以为历史上整体的岭南诗歌都属于岭南诗派。其实，大多数岭南诗人及其诗作，都是平庸的，不具备上述的几点特色，不能归到岭南诗派中来。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页。

从张九龄应制诗看唐诗由“初唐之渐盛”

陈建森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 张九龄的应制诗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的历史进程中,形象地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以昭切洗练的叙事和委婉含蓄的比兴讽谕形成一种典实醇正、雄浑儒雅的艺术趣向,成为引领“盛唐之音”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关键词: 应制诗;注重国事;注重事功;典实醇正;雄浑儒雅

作为开元名相和著名诗人,明清诗学界一直认为张九龄对唐诗由“初唐之渐盛”^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一指出:“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道。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②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二中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③刘熙载在《艺概》卷二《诗概》中指出:“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④20世纪以来,学界对张九龄诗歌的评价并没有超出明清诗论家的评说。

然而,学界认为张九龄为唐诗由“初唐之渐盛”作出重要贡献,主要是针对张九龄的登临行旅、山水景物、感遇、咏史、咏怀诸诗创作而言的,并不涉及张九龄的应制诗。近人顾建国在《张九龄研究》中专辟“张九龄应制诗”一节,但只从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着眼,指出其“雅正俊爽,言事昭切”的艺术特色^⑤。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五排凡例”评云:“张曲江、宋广平、张燕公、苏许公应制诸作,雄厉振拔,见一代君臣际会之盛。”^⑥一个朝代的应制诗能够从君臣活动指向中呈现出统治阶层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文坛的审美趣向,并对同时期诗坛的创作风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张九龄的应制诗,有助于理解张九龄在唐诗由“初唐之渐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呈现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和注重事功的价值追求

据《四部丛刊》本《曲江集》卷二载“奉和圣制”诗二十七首,卷五载《龙门旬宴得月子韵》、《上赐水窗旬宴得移子韵》、《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子韵》、《敕赐宁王池宴》四首,张九龄现存应制诗三

① 高棅:《唐诗品汇·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②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③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④ 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⑤ 顾建国:《张九龄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6~149页。

⑥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9页。

十一首^①。长期以来，我们对应制诗的认识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此类诗在内容上无非是歌功颂德，起粉饰升平、声色娱兴的作用。如《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二十首，其中十二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沈佺期、宋之问与上官仪一样，也写了许多奉和应制、宴游、酬答的诗；李峤、苏味道位显名高，所写的多是逢场应景的奉诏之作。唐太宗、高宗两大宫廷诗人所写的应制诗，反映了当时君臣际会时逢场应景、优游宴乐的活动指向。毫无疑问，唐玄宗开元前期与群臣的唱和诗，仍然有歌功颂德、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轻歌，但值得重视的是，这时期的应制诗描述了当时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情状。

张九龄的应制诗主要作于两个阶段：一是开元十年（722）至开元十五年（727）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及守中书舍人期间；二是开元十九年（731）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奉诏还京先后任秘书少监、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诰、中书令期间。

张九龄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及守中书舍人期间，朝廷有四件大事：第一是要稳定西北局势；第二是玄宗北巡；第三是择廷臣为诸州刺史；第四是玄宗东封泰山。

开元前期，唐朝北部和西北地区很不平静。开元八年（720）四月丙午，大食欲诱乌长王、骨咄王、俱律王叛唐，三国不从^②。“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③开元九年（721），“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陵、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④，“秋，七月，己酉，王陵大破康待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集四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⑤，康待宾余部康愿子续乱反唐。开元十年，闰五月，玄宗敕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进兵讨擒。唐玄宗御制诗送张说巡边，群臣应制奉和。唐玄宗《送张说巡边》云：“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命将远绥服，雄图出庙堂……”^⑥，表达以文化远、以武靖边的国策。张九龄《奉和圣制送燕国公赴朔方》云：

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一作北）颡扬旌。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山川勤远略，原隰殄皇情。为奏熏琴唱，仍题宝剑名。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歌钟旋可望，衽席岂难行！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⑦

计有功《唐诗纪事》云：“明皇送张说巡朔方赐诗云：‘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说应制诗有‘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之句。张嘉贞云：‘山川看是阵，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枕杜，凯入系名王。’徐知仁云：‘由来词翰首，今见勒燕然。’皆取制胜之意。独九龄诗云：‘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颡扬旌。’又曰：‘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宋璟诗云：‘以智泉宁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⑧周珽辑定《删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训云：“首四句美其人相出将，得行兵之胜算。次四

① 顾建国《张九龄研究》统计，张九龄应制诗二十九首，占其现存诗歌二百二十二首的百分之十三，或将插入卷一“奉和圣制”诗中的《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乐》和《南郊太尉酌献武舞作凯安之乐》两首郊庙乐章误认为是应制诗，而又将卷五中《龙门旬宴得月子韵》、《上赐水窗旬宴得移子韵》、《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子韵》、《敕赐宁王池宴》四首排除在应制诗之外。（见顾建国《张九龄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40页。

③ 同上书，第6742页。

④ 同上书，第6745页。

⑤ 同上书，第6746页。

⑥ 《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页。

⑦ 《全唐诗》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6页。

⑧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2页。

句见其膺命出师，荣宠可羨。中四句见其远体圣衷，有不专战伐。又四句见其威信所及，速能奏积。末四句望其安辑足赏，应还耸帝聪也。按《唐书》，时边镇兵赢六十万，张说以时平无事，请罢二十万还农。故曲江进诗，首即以休兵赞之。其曰‘方偃革’、‘颺扬旌’，曰‘歌钟’、‘枕席’，无非期以抚安之利。朝廷安边良策，老臣谋国长谟，尽在是矣。”^①可见，在处理此次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上，与张嘉贞、卢从愿、徐知仁等人尚兵崇武相比，张九龄不专战伐、主张休兵抚安不失为长远良策。

开元十一年（723）春正月己巳，唐玄宗自东都洛阳北巡潞州、并州，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二月戊申还至晋州，祭后土于汾阴；三月庚午，还至西京长安。^②唐玄宗此次北巡表面上看是重游和缅怀先圣起兵发迹之故地，实际上亦有威服北部部落之意，其过王潜墓、登太行山、幸晋阳宫、南出雀鼠谷、渡蒲津关，所到之处，君臣唱和，为一时之盛。从《全唐诗》所载应制诗，可知当时随驾北巡有张说、苏颋、张嘉贞、宋璟、赵冬曦、王光庭、王丘、袁晖、席豫、张九龄等人。如张九龄《奉和圣制过王潜墓》：

汉王思钜鹿，晋将在弘农。入蜀举长算，平吴成大功。与浑虽不协，归皓实为雄。孤绩沦千载，流名感圣衷。万乘渡荒陇，一顾凛生风。古节犹不弃，今人争效忠。^③

玄宗《过王潜墓》感叹墓主“受任敌已灭，策勋名不彰。居美未尽善，矜功徒自伤”^④。张诗却肯定王潜“平吴成大功”，同情其“孤绩沦千载”的遭遇，对历史人物王潜是非功过的评判较玄宗诗更为公允。

开元十三年（725），为了加强诸州的治权，“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钱于洛滨，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上自书十韵诗赐之”^⑤，“且给笔纸，令自赋焉”^⑥。玄宗《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哉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祇命，知予眷万方。”^⑦玄宗以诗充座右铭向诸州刺史交代职责，并寄予厚望。张九龄《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云：

圣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劳苍生念，不以黄屋尊。兴化俟群辟，择贤守列藩。得人此为盛，咨岳今复存。降鉴引君道，殷勤启政门。容光无不照，有象必为言。成宪知所奉，致理归其根。肃肃稟玄猷，煌煌戒朱轩。岂徒任遇重，兼尔宴锡繁。载闻励臣节，持答明主恩。^⑧

诗高度赞扬皇帝关怀苍生、亲选德才兼备的人充诸州刺史、驻守列藩、振兴教化之英明决策，勉励诸州刺史替天行道，依法行政，励行臣节，报主明恩。

开元十三（725）年冬十月，唐玄宗东封泰山，从东都洛阳出发，次成皋，登泰山，幸孔子宅，十二月返回东都。^⑨九龄有《奉和圣制次成皋先圣擒建德之所》、《奉和圣制经孔子旧宅》、《奉和圣制登封礼毕洛城酺宴》等诗，或缅怀先圣艰难创业的伟绩，或嘉赞东封告成功于天地神明之盛事。

开元十九年（731）至开元二十五（737）年，张九龄奉诏还京先后任秘书少监、工部侍郎集贤院学

① 周珏辑定：《删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崇祯乙亥刻本。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54～6755页。

③ 《全唐诗》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7页。

④ 《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页。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63页。

⑥ 《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题下注，《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页。

⑦ 《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页。

⑧ 《全唐诗》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4页。

⑨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189页。

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诰、中书令期间所写的应制诗，值得特别关注的有《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

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课最力已陈，赏延恩复博。垂衣深共理，改瑟其咸若。首路回竹符，分镳扬木铎。戒程有攸往，诏饯无淹泊。昭晰动天文，殷勤在人瘼。持久望兹念，克终期所托。行矣当自强，春耕庶秋获。^①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载，太宗贞观元年（627），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陇右剑南、岭南使道。开元二十二年（734），九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的身份“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②。《唐会要》卷七十八：“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取置使，以御史中丞卢绚等为之。至三月二十三日，诸道采访取置使、华州刺史李尚隐等奏请各使置印。许之。”^③采访处置使掌管检查刑狱与监察州县。各道每年派遣朝见皇帝、谒见宰相报告政情的使者为朝集使。可知，复置十道采访使本是九龄的动议。此应制诗表达了九龄关心民瘼、主张地方官吏应具有改革精神、充分施展行政能力、争取良好的政绩的吏治思想。

在唐代文化生态环境中，应制诗隶属于统治阶层主流文化的范畴。人主的好恶、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应制诗的题材和内容。与初唐宫廷诗人的应制诗相比，以张九龄为代表的盛唐开元应制诗在题材内容上有了新的拓展。开元应制诗可以议论军国大事，可以评论历史人物，可以表达治国理念，甚至可以论道谈玄。盛唐开元应制诗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政策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君臣的精神风貌。这些应制诗不仅描述了开元前期君臣注重国事的活动指向，也展现了统治阶层关心民生、注重事功、安邦定国的价值追求。

二、由“绮错婉媚”渐向典实醇正和雄浑儒雅

作为一种遵命的宫廷文学，毫无疑问，应制诗受到特定语境的限制，需要投合人主的艺术趣味，由此而呈现一个朝代统治阶级核心集团的艺术趣向，并直接影响着当时诗坛的创作取向。

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二中曾指出：“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④“一家句法”之说，并不完全符合盛唐应制诗的实际情况。

《隋书·文学传序》对六朝文学提出批评：“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⑤因而主张文学应走南北文风融合的道路。南方的清绮、北方的气质“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⑥。唐太宗在《帝京篇十首·序》中亦云：“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⑦然综观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两大宫廷中魏征、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李峤、苏味道、上官婉儿等人的应制诗，在题材内容上大多是点缀升平、逢场应景之作，虽无宫体诗那种“裸裎”的文字，但仍带有齐梁清绮的遗风。《全唐诗》上官仪小转载，“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他官运亨通，

① 《全唐诗》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4~565页。

② 《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99页。

③ 《唐会要》卷七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3页。

④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⑤ 《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⑥ 同上书，第1730页。

⑦ 《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